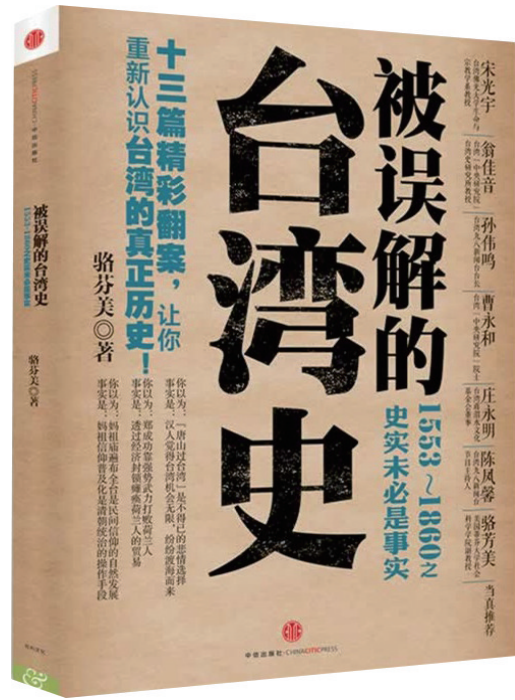


郑成功依靠经济封锁收复台湾



《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
作者:骆芬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1661年,郑成功起兵攻入台湾,驱逐了荷兰殖民者,将宝岛收复。无论在我国内地,还是台湾,都因此将历史教科书中将郑成功称为民族英雄。这个称谓当然不存在问题,也符合历史事实,但教科书及通常史书上的叙述细节却存在很大问题。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在事实上继承泉州籍巨商李旦垄断东亚海域商贸的地位后,也效仿李旦的做法,不

仅尊奉明朝皇室,投效福建官府,而且还与日本的德川幕府、盘踞东南亚和中国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郑芝龙被明朝招抚,从“海防守备”一路升至福州总督。荷兰殖民者为讨好郑芝龙,与之签署了商业与军事合作协议。清军入关并席卷中原后,郑芝龙投降,其子郑成功拒绝降清,而是竖起反清大旗,与之同时还整合了其父势力,希望继

续控制东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郑成功势力在当时应被界定为武装割据的海上军事商团势力,最初并没有对荷兰人占据台湾提出实质异议。

但当清朝中央完成中原一统,郑成功势力所控制的地域范围被不断蚕食,荷兰殖民者又打算抛开郑家寻求更稳靠的贸易伙伴。这当然是郑成功无法容忍的,双方的合作关系开始出现裂缝,并逐渐上演直接冲突。正视这些历史事实,并不至于影响台湾自古以来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以及郑成功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并且,还将有助于驳斥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将海上贸易、商业文明说成是欧洲人专利的谬论。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博士,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专任副教授骆芬美所著的《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一书,近日引进到内地出版。这本书发掘并引用了大量的历史直接记录,还原出1553—1860年间中国台湾地区历史的诸多真实细节——这些历史真实,在内地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中,或被简化的历史叙述和定论所掩盖,或受到严重误读,而长期鲜为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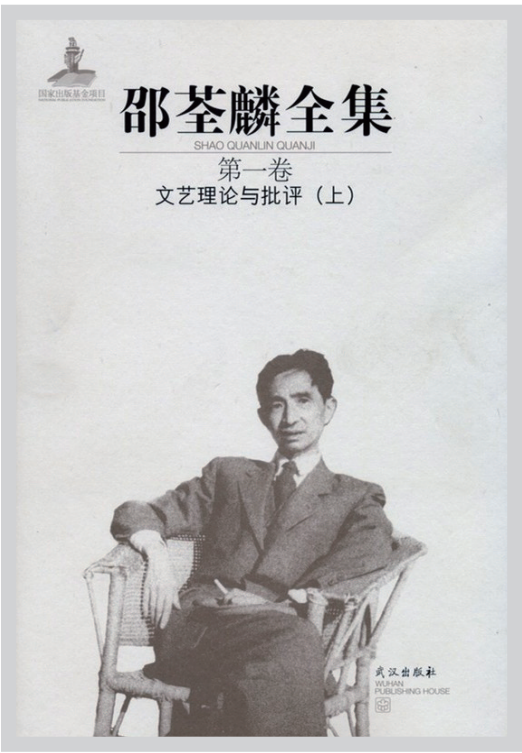
以本文开篇引述的郑成功势力与荷兰殖民者爆发冲突的起因为例,点明郑家势力的性质,可能会让那些习惯于用典型忠臣良将标签解读历史的人感到颇为失望,却更符合历史逻辑:如果从郑芝龙到郑成功,以至后来的郑经,郑家势力不是一个海上军事商团的话,就无从筹集收复台湾、后来长期对峙清朝中央的经费资源,也不可能拥有足以击溃荷兰殖民者、震慑其他欧洲国家殖民团伙的军事技术。

同样可能让习惯了教科书版本

叙述的朋友感到惊愕的是,郑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收复台湾,最大的依仗并不在于军力(尽管其军事力量确实足以压倒荷兰殖民者),而是经济封锁。骆芬美在《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这本书中就介绍指出,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目的在于在当时的东亚、东南亚贸易中占据主动。郑成功决心驱逐据台的荷兰殖民者后,对之采取禁运战略,直接击破了后者的贸易链条,大批到台湾务农经商的福建居民为此返回大陆。荷兰人一度派来了海军舰队准备迎击郑成功的军队,苦等无果后就撤回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当时荷兰殖民者在亚洲的中心据点),之后,郑成功才对已经陷入空前疲敝的据台殖民者发起了致命一击。

《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书中还介绍了其他一些很难“出现”在教科书成为“史实”的“事实”,对于内地读者加深对台湾历史的了解很有帮助:荷兰殖民者在据台的30多年里,对台湾进行了积极开发,特别是大力引进福建等沿海省份的汉族居民到台务农和从事商贸,并在台湾先住民部落中开创了自治式的头目制度;郑成功死后,台湾郑经势力在与清朝中央对峙期间,因清廷推行海禁令造成了贸易和财政困难,专门“招商引资”引来了英国商人,英国人对中国的实际了解始于此,几十年后为突破清廷贸易限制、逆转贸易逆差而推出了鸦片贸易;郑成功来台之后,台湾民间曾一度信赖玄天上帝(真武大帝,明王朝册封的海神、北方最高神明),施琅逼降郑克塽后,清廷为了收拢台湾人心,转而推崇另一位海神妈祖,竭力通过官方力量“造神”。 (来源:新华读书)

接近一个真实的邵荃麟



《邵荃麟全集》
邵荃麟
武汉出版社

邵荃麟是一位历史人物。他从1925年起直到“文革”被剥夺各项权利止的40年间,经历了现代史上几个时期社会政治的动荡、分化、改组,他从中共革命的青年参与者,进入中高级领导层,几度沧桑,最终沦为阶下囚而丧生;其间辗转于上海、东南、川桂、香港和北京,从早年作

为左翼文学家的创作、评论和译著,到后来作为革命干部的讲话和文稿,更不用说他所从事的实际组织领导工作,都成为当时当地一定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在全集中保留的文本,包括文学方面的著译,也都一起成了不折不扣的“文史资料”。由于邵荃麟从抗日战争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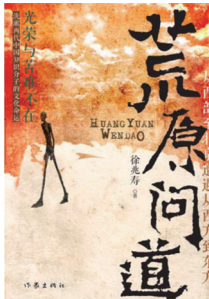
发后近30年所处位置的重要,影响的深远,这些“史料”的价值弥足珍贵。因为,真正要研究历史,须从真相开始。而要研究当代相应阶段的中国政治,中国文化,包括党的文化政策、统战政策,其中某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重要事件,可从全集中找到第一手文字实证;即使是邵荃麟的文学作品,因其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倾向性,不仅是折射社会现实、文化动态的旁证,也是考察当时左翼知识分子思想面貌的文字化石。

在面对反映了邵荃麟一生丰富经历的全集之前,仅从他1953年至1966年转到作家协会任职的十年来看,我们就已经发现他是当时文学界主流理论和实践,文学界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当事人或见证人,也是研究那一时期并远溯30年代至40年代时绕不开的人物。老实说,1981年《邵荃麟评论选集》出版的时候,我只是把它当作对不幸受迫害致死的文学长辈的一种纪念,而认为他的评论所标志的时代已经逝去,时过境迁,并没有认真阅读,更没有认真思考。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自己,我想还有不少跟我类似的人,已经认识到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和具体分析现代历史的重要。当然这更多寄希望于专业的学者,但我相信,这件事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朋友的关注。因此,武汉出版社跟邵荃麟家属合作的这一成果,如同其过去出版的若干同类文集一样,具有历史性的贡献。

接到样书,我对全集的作者,犹如对一部传记的传主,几乎等于第一次发现一位被历史有意无意忽略的人。我惭愧于过去实际上对他知道得多么少,只是神龙的一鳞半爪——比如,最早是看到香港《大众文艺丛

刊》,知道这个陆续批判胡风等人的刊物,其主编名叫邵荃麟,然后是知道他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国政协会,不久又到作协主持党组工作,参与领导多次政治运动。其间,1954年《人民文学》杂志给我的一篇退稿上,曾有他和严文井、贾芝、葛洛四位编委的签名,才知道他不是挂名的主编。我因不在作协系统更不在作协机关,跟他没有直接的接触。“文革”结束后,惊闻他1971年在秦城监狱惨死,与此同时,从黄秋耘同志和其他作协友人处听说他的为人很正派,也包括他在反右以后还曾私下问起过我的处境和遭际。这些迥异于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口碑,使我不能不对像他这一类型身为老革命、体制内高级干部的知识分子的经历和思想状况,多了一些思索。就在这次对全集的粗粗浏览中,发现邵荃麟同志1944年写过一篇对路翎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的评论,充分肯定了这位青年作者早期的代表作,说这“不是那种以飘然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总之,这是一本不允许我们随意翻翻当作消遣的书”,这样的作品符合荃麟本人的文学理念,他十分中肯地剖析了书中悲剧人物郭素娥和张振山、魏海清三人性格的形成,他们必然和可能的走向。这些话,跟他在几年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性话语是多么不同啊!这让我想到特定形势下的个人文字和言论,看来是要同职务写作加以区别的。两者或有的差异是可以理解乃至同情的。这里提供的是一个个例,但似乎也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供深入研究。

作为一个读者,再一次对这部全集的编辑者、出版者说一声谢谢,你们让我们有机会接近一个真实的邵荃麟。 (来源:新华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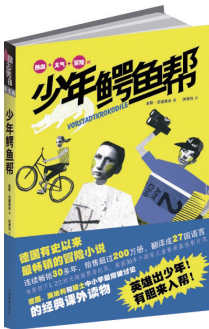
《荒原问道》
作者:徐兆寿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由于“反右派”斗争,好问先生和彭教授被下放到一个叫双子沟的地方。又由于彭教授的死亡,使好问先生隐姓埋名。本想着在河西做个好医生的夏忠却因一场婚外情又被逼到生活和情感的悬崖绝壁,生活等着他的第二次选择。



《城与乡》
作者:吴泽民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这是一幅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新世纪的今天,将近四十年的中国城乡社会人生长卷。小说用第一人称讲述主人公从乡村辗转都市、最终殒命的曲折一生。在对民情、民生、民俗、风情,各种人物人生事业命运的叙述中,小说深入地触及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后,城乡人与人关系的巨大变化。



《少年鳄鱼帮》
作者:麦斯·范德葛林
出版社:吉林摄影出版社

每个鳄鱼帮少年,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做一件独一无二的事,当这些个性迥异的少年相遇时,会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时值酷热的六月,小镇商店莫名其妙遭窃,警方却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总是坐在轮椅上的库尔特宣称他握有三条神秘的线索,鳄鱼帮少年要如何凭着他的线索找到犯人?